

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美国军事同盟

李 晨

内容提要：美国军事同盟体系是美国亚太战略，包括当前“再平衡”战略的支柱和工具之一。它不仅要为美国对亚太的政治、经贸战略服务，还要满足美国在本地区多样化的军事需求。美国需要加强同盟伙伴关系，利用亚太国家对于中国的担忧，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但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不是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目标，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也不会转型为冷战时期的北约类型的全力制衡中国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加大对中国军事压力的努力，并不会改变中美之间的战略态势。从战略上看，美国同盟体系的强化始于低战备的起点，未改变业已存在的军事竞争格局，各方都无意进行全面动员和对抗。由于战略选择的制约，美国强化亚太军事同盟的空间有限，加之中国自身军事力量的建设与发展，当前亚太军事力量对比也不会改变。在力量对比不改变的情况下，各方虽然出于最坏打算需要为可能的冲突做准备，但都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局限和冲突的风险，需要进一步强化危机管控的意识。中国也应充分认识自身战略选择与实施对于美国同盟体系的影响力。

关键词：亚太再平衡 美国军事同盟 美国军事战略

2015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鲍德温·卡特（Ashton Baldwin Carter）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已经进入新阶段，国防部的工作重点包括深化同盟伙伴关系，优化美军部署，以及在武器平台和能力建设上加大

投入。¹ 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也要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首先，美国在本地区的外交与军事战略需要与盟友的利益相契合，以确保政治上获得充分的认可和支持；其次，美国前沿部署兵力大多依托于盟友提供的基地和相应的后勤支援保障；最后，受制于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瓶颈和多元化的全球安全威胁，美国自身在亚太可部署和利用的军事力量有限，需要盟友增加军力投入，加强战备，强化与美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并承担更多相关义务。

随着朝核、东海南海争端等西太平洋地区热点问题的升温，美国借机加快其同盟体系的强化。2015年，美国与日本完成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的修订，日本也修改国内相关安保法案，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扩大了日本与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合作的范围。菲律宾正式批准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定（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后，美军再度获得菲律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2016年美菲“肩并肩”演习后，美国空军参演的A-10攻击机、HH-60直升机按计划进驻克拉克空军基地，并且开始在南海黄岩岛周边进行巡航。² 卡特宣布，美国 and 菲律宾海军于2016年3月在南海展开联合巡航，并根据东南亚海上安全计划（Southeast Asia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向菲律宾提供第一批4250万美元援助，用于在相关海域实现信息共享、威胁识别以及合作应对相关挑战。³ 在美国的整合下，其亚太盟友的军事合作也开始超越传统的双边军事同盟框架。在朝鲜新一轮核试验和卫星发射、弹道导弹试验的刺激下，美、日、韩三边合作已经机制化。美日澳、美日菲在南海的合作也通过联合演训、舰机交流访问等方式得以实现。

对中国而言，因低估美国同盟体系的战略调整和战备程度而应对不足，或因高估相关态势而反应过度都会给自身造成被动。

中美在亚太已经出现了局部军事竞争的态势，美国部分盟友与中国也存在海洋领土争端。因此美国军事同盟的走向及影响，尤其是其战略调整的幅度，以及针对高技术、信息化常规战争的战备程度非常值得关注。对中国而言，因低估美国同盟体系的战略调整和战备程度而应对不足，或因高估相关态势而反应过度都会给自身造成被动。只有考虑到历史经验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战略和战役层面的发展动力和制约因素，中国才能对美国军事同盟的走向及其

1 “A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Where Everyone Rises”, May 30 201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606676/iiss-shangri-la-dialogue-a-regional-security-architecture-where-everyone-rises>, 2016年6月4日登录。

2 “Pacific Air Forces A-10s, HH-60s Fly First Air Contingent Missions in Philippines”, April 22 2016, US Pacific Command, <http://www.pacom.mil/Media/News/tabid/5693/Article/741238/pacific-air-forces-a-10s-hh-60s-fly-first-air-contingent-missions-in-philippines.aspx>, 2016年6月4日登录。

3 “Joint Press Conference by Secretary Carter and Secretary Gazmin in Manila, Philippines”, April 14 201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721687/joint-press-conference-by-secretary-carter-and-secretary-gazmin-in-manila-phil>, 2016年6月4日登录。

影响有更好的把握。

一、冷战产物？

美国当前的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与冷战有着密切的联系。美苏对抗的国际格局，以及在其影响下亚太地区出现的一系列变革、危机与局部冲突，促使美国和部分亚太国家和地区在冷战时期结成了军事同盟。然而，进一步考察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的缘起和特点，不能仅停留于冷战产物这一视角。

同盟在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反复出现。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实力的悬殊、利益的重合与冲突等，都为同盟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在20世纪前那个国际关系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传统军事同盟的运行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战争形态的发展。在早期近现代的王朝战争和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初期的工业化战争中，大国在投入战争前，都要经历由平时向战时状态的转换。其次是欧洲的地理环境。欧洲大国彼此邻近，有利于军事同盟在战时迅速实现协同与配合。基于战争形态和欧洲地理环境，结成军事同盟的国家平时主要任务是保持各自常备军的规模与装备水平，战时根据需要进行战略或战役层次的协调与合作。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对于战后的军事同盟产生巨大的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机械化战争的形态已经完全成形。在特定条件下，战争不仅速度加快，而且破坏性增加。例如，德国1940年5月向西欧发起全面进攻，6月就击败了法国；1941年6月进攻苏联，冬季到来时已攻至莫斯科城下。日军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2年春季，不仅重创美国、英国海空力量，而且攻占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美国通过二战得到的主要战略教训包括全球安全观念，以及防止战略突袭重演。冷战背景下，为对苏联阵营实施有效的威慑，对其进攻和其他威胁做出快速反应，即使在平时时期，美国也需要与盟友在军事上进一步加强合作，包括战略规划、军事力量部署和作战演练。

亚太与欧洲的地理环境差异也对同盟政策产生了影响。结为同盟的欧洲国家之间国土邻近，在机械化战争时代之前，各国在本土进行的军事力量建设即可产生对盟友的保证和对潜在对手的威慑。而重心位于亚太之外的大国，要与之内国家维系同盟关系，必须依靠远程力量投送能力，并在本地区保持可靠的军事存在。例如，19世纪末期，英国依托在新加坡、香港的海军基地，在远东部署编有战列舰的中国舰队（China Station）；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活动，以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使其真正具备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和力量投射能力。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晚清决策者正是看中这一点，才先后尝试联合英国和俄国制衡日本。20世纪初期，日本为了和俄国抗衡，选择与英国结盟，同样与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密不可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

的英国的差异在于，前者无法通过殖民地的防卫和部署来维持前沿存在。在菲律宾独立之后，美国在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一岛链缺乏支撑其前沿部署和军事存在的基地体系，只有通过军事同盟的安排，在西太平洋盟友领土上获取驻军权和军事基地使用权，才能保持军事存在，履行同盟义务，获得盟友的真正信任。

可见，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冷战的大背景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了结盟的战略需求。二是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演变，尤其是对苏联实施有效威慑，防止战略突袭的战略观念，使得美国需要在和平时期承担同盟义务，和盟友保持密切的军事合作。三是在地理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必须要在盟友领土驻军，使用其基地，才能实现其支撑同盟的前沿部署和军事存在。冷战结束后，虽然苏联不复存在，但亚太国际关系中，军事竞争、地缘政治、海洋领土争端等传统安全议题仍长期存在，为美国维系其同盟体系提供了政治氛围。而地理环境和军事技术决定了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存在和运行方式，即美国对盟友承担平时义务，保持密切的军事合作，利用盟友领土和基地维持军事存在和前沿部署的方针并不会改变。

二、冷战经历：地理环境、威胁性质与军事同盟

冷战初期，美国建立了两种军事同盟体系，即亚太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和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多边军事同盟体系。通过比较这两种体系的组织和运行差异，可以进一步把握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的特性。亚太同盟体系所处的环境为濒海或海上战区，而北约所处的环境则为大陆战区，所面临的不同性质的威胁，也影响了两种同盟体系的战备程度以及盟友之间的权利义务。

冷战期间，北约与华约军事力量在中欧形成对峙。对于北约而言，最严重的军事威胁来自于华约地面部队和协同作战的战术航空兵部队。位于东、西德边境的“中央战线”（Central Front）成为北约军事战略规划中的重中之重。从力量对比来看，苏军和华约其他国家武装力量保持了针对北约的地面部队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且在双方长期的军备竞赛中，苏联地面武器装备的整体质量与重视技术的北约装备也能够相提并论。虽然美国在冷战期间两次实施“抵消战略”（Offset Strategy），包括50年代强调战术核武器的使用，以及70年代强调作战层面的技术运用和战法创新等，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两大阵营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对比。从作战样式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英国和苏联军队都在欧洲实施过大规模装甲机械化作战。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地面部队主力为相互对称的机械化部队和战术航空兵部队，而且各自主战装备的火力、机动与防护性能不断提高，指挥控制和情报收集分析体系快速升级。双方的地面作战理论，尤其是苏联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80年代出现的北约“空地一体战”理论，也在根据未来战场态势的变化，不断修订和完善。因此，在升级为核大战之前，两大阵营都认为

在欧洲的交战方式将会是升级版的大规模装甲机械化作战。从北约欧洲盟友的视角来看,由于欧洲大部分国家领土有限,一旦战争爆发,双方地面部队正面突击侧翼迂回,并向纵深持续发起攻势,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置身度外,都将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为了适应欧洲的陆上战略态势,北约的军事体制从战略到战役和战术层面,都高度重视战备、威慑和作战。在战略层面上,北约非常重视各国战略资源的调查与动员。北约还建立了如同单一国家武装力量的自上而下的指挥体系,形成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到各作战方向联合作战司令部,再到各军兵种作战部队的联合作战指挥链。来自不同国家的部队,如美国陆军的第五、第七军,英国的莱茵军团,根据实际战略需求和统一的作战计划,在一线、二线和后方进行部署。在北约体制下,各国军队既有的指挥体系在战略和战役层面已经弱化。在日常战备工作中,北约盟国军队不仅统一武器装备制式以便于后勤保障和联合作战,而且各国的作战理论与条令也都是围绕同盟作战的需求修订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尽管美军希望防御作战时有更多机动空间,但西德军队所进行的是本土防御,不得轻易后撤。美军便决定遂行保卫西德任务,需要与西德统一作战条令,成为美军修订作战条令时,弱化机动作战的一个因素¹。

为了落实战备,北约军队不仅不断修订战区各级作战计划,而且经常根据作战计划进行战场建设和联合演训。虽然北约中的欧洲盟国在冷战期间出于经济和民生发展的考虑,倚仗美国的安全承诺和投入,不断削减自身军费开支,制约了北约整体军事实力,但北约面对苏联威胁,还是在军事同盟体制和日常运转中保持了高度的战备状态。

冷战时期亚太安全环境与欧洲存在明显区别。首先,地理上,除了韩国和南越,美国绝大多数亚太盟友与苏联及其盟友在陆地上并不相邻,而且美国亚太盟友之间也少有陆地接壤。因此,与欧洲相比,海洋的阻隔本身就减少了敌对阵营的战略压力,并且削弱了这种压力在不同盟友之间的传导。例如,即使朝鲜战争中出现北方统一南方的情况,也不意味着日本的防卫将崩溃。其次,美国在海空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和对制海权的牢牢掌握,进一步降低了与敌对阵营没有陆上接壤的盟友遭受外来侵略的风险。在欧洲,苏联和华约集团的陆军具备对北约欧洲盟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而在亚太,苏联及其盟友的海空军在技术、兵种和协同作战上长期存在短板,无法从美国海空军手中夺取制海权,意味着苏联阵营的陆军力量难以投送至美国大多数亚太盟友的本土。最后,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相对有限,50年代其在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中对于朝鲜和中国的有限支持,都体现出其支持盟友的前提是不与美国在本地区发生大规模直接冲突。

1 Romie L. Brownlee and William J. Mullen III, *Changing An Army: An Oral History of William E. DePuy*, Washington DC.: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88, pp. 190-193.

尽管韩国、南越等国在特定时期内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在冷战期间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于国内。例如，日本、韩国、南越等国都面临着全方位的战后重建的艰巨考验。其他盟友，例如菲律宾，作为战后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国内制度建立和经济发展也是首要任务。日本、韩国和南越在冷战期间不同的轨迹表明，在美国的安全承诺兑现之后，国内建设和发展是应对国内外威胁和考验的基础。美国也意识到这一点，不仅向盟友提供军事保护，而且为其发展提供援助，创造有利条件。加之海洋战区带来的优势，美国在亚太的双边同盟体系在军事上的特点是单向义务和有限战备。即美国不仅对盟友分别提供军事保护，同时还维护海权，确保自身与盟友之间的海上联系；盟国仅为美国驻军提供条件，协助美军布防，而军事力量建设仅限于自卫，并保持较低的战备水平。因面临强大陆上威胁，韩国军队与美军在作战指挥上实现一体化，并保持较高的战备状态，这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中也属于特例。

需要指出的是，亚太双边军事同盟对于安全环境的变化较为敏感。例如，朝鲜战争的冲击为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的建立打下基础。美台军事同盟在50年代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正式建立，又终结于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70年代在越南战争失利的阴影下，苏联军事威胁的加剧，尤其是其远洋海军的发展和活动，让美国在亚太感到力不从心，推动了美日第一个防卫指针的出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活动和任务的扩展。

三、“再平衡”战略对军事同盟的需求

冷战结束后二十年间，亚太安全形势的变化塑造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致力于建设其领导下的国际秩序，无意拆解其亚太同盟体系。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等亚太地区长期存在的传统安全问题并未随冷战一同消失，而且到90年代中期逐渐凸显。美国遂将亚太战略重点转为应对以上地区安全问题。这一时期，得益于冷战后期针对苏联威胁扩军的红利，美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空力量，相对于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享有绝对优势。2000年12月，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非拉国际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世界军事力量对比出现了严重的失衡。”¹由于“时代差”的存在，美国亚太驻军应对地区安全问题并不感到吃力，对于盟友的军事需求有限。1997年美国与日本虽然修订《美日防卫指针》，增加

¹ “机械化和信息化是我军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2000年12月11日，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周边事态”条款，但主要强调日本在后勤保障、情报收集、扫雷等方面对美军提供支援。¹ “9·11”事件后，美国全力投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战，并于2007年后遭遇金融危机，都影响了其对于亚太事务的关注和海空力量现代化建设。而基于长期的经济增长，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则与日俱增，被外界广泛称之为“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也稳步推进，海空作战能力不断增强。21世纪初期，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担忧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威胁。² 可见，中东战事、金融危机和中国崛起对美国在亚太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形成一定冲击。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为了扭转美国在国际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强化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应对中国崛起，并从亚太的发展中更多受益，美国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从目前美国相关战略规划和实施情况来看，其所追求的目标和所使用的手段都具有多样性。2016年4月28日，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Tony Blinken）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出，“再平衡”战略旨在深化美国与亚太的战略、经济和外交联系，让这些联系与亚太对美国的重要性相吻合。“再平衡”战略的七大支柱包括强化核心同盟体系、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崛起国家加强接触、与东盟等本地区国际组织和机制加强联系、促进贸易和投资、加强军事存在、推动自由民主价值观、促成新的三边和多边合作框架。³

到目前为止，作为超越单纯外交或军事战略的大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包含对中国防范与威慑的部分，但不是冷战时期对苏“遏制战略”的翻版，更不是为了与中国展开全面军事对抗和大规模战争做准备。“再平衡”战略对美国军事同盟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希望通过军事同盟加强其在亚太的领导地位。军事同盟是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主要国家双边关系的关键部分。因为双边军事同盟的存在，美国与盟友的双边关系也比与非盟友的关系更为牢固。作为美国“再平衡”战略的起点和支柱，军事同盟本身就需要强化。而美国盟友对于中国崛起的忧虑，以及海洋领土争端的升级，给美国提供了强化军事同盟的良机。而通过强化军事同盟，提升与盟友的双边关系，美国在地区问题、多边场合，甚至很多全球问题的处理中，可以得到盟友更多的支持。

其次，军事同盟与美国在亚太的经济贸易议程之间也存在联系。“跨太平洋

1 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 September 23 1997, Ministry of Defense, http://www.mod.go.jp/e/d_act/anpo/19970923.html, 2016年6月4日登录。

2 Andrew Krepinovich, Barry Watts, and Robert Work, *Meeting the 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 Challeng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May 2003, <http://csbaonline.org/publications/2003/05/a2ad-anti-access-area-denial/>, 2016年6月4日登录。

3 Obama Administration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April 28 201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s/d/2016d/256694.htm>, 2016年6月4日登录。

伙伴关系”在推进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国内阻力和包括美国亚太盟友在内的国际阻力。而军事同盟关系则是化解双重阻力的有效工具。对于美国盟友而言，出于对中国的担忧，需要进一步强化和美国的同盟，在对美贸易谈判时也需要通过给美国让步予以回报。而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国国内舆论对于贸易谈判持强硬立场。但在安全上，美国主流舆论倾向于将支持盟友视为道义和政治正确。因此，在动员国内支持的过程中，美国决策者不仅强调美国需要在亚太掌握贸易规则制定权，而且还不断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地缘政治影响。

最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强调对军事同盟的多重军事需求。日本、澳大利亚等军事能力较强的盟友，可以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提供支援。通过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军事同盟，增强盟友的军事能力，美国可以在亚太之外获得更多军事支援。第二，在亚太范围内，美国也需要应对多种威胁，包括朝鲜核武器和远程导弹的威胁、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也需要盟友加强军事实力，承担更多责任。当前美国力促美日韩三边合作，主要针对的是朝鲜半岛。最后，面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美国不仅需要增加自身军事部署，还需帮助其盟友发展军事力量，以确保总体优势，强化对中国的威慑，并为应对危机升级引发的冲突加强战备，这都需要依托同盟体系来实现。

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不是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目标，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也不会转型为冷战时期的北约类型的全力制衡中国的工具。

军事同盟体系是美国亚太战略，包括当前“再平衡”战略的支柱和工具之一。军事同盟体系不仅要为美国对亚太的政治、经贸战略服务，而且还要满足美国在本地区多样化的军事需求。美国需要加强同盟伙伴关系，利用亚太国家对于中国的担忧，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而且这种压力还存在进一步增加的空间；但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不是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目标，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也不会转型为冷战时期的北约类型的全力制衡中国的工具。

四、对华军事压力

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的主要亚太军事同盟都得到了强化，包括美国对于同盟义务的重申，兵力部署的调整，对于盟友提升军力的支持，以及通过联合计划、演训和巡航来加强战备等，对中国形成了一定战略压力。但这种压力是否会进一步增大到完全改变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态势，需要进一步探讨。

当前亚太军事态势具备两个特点。一是中国与美国及其部分盟友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军事竞争，但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战略上重视避免冲突，不把军事力量视为实现目标、解决争端的唯一手段。二是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中美军事技术的“时代差”逐渐缩小为“代差”，意味着20世纪90年代向美国“一边倒”的作战环境已经消失。但美国的海空和高技术军事优势将持续。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

一种相对军事优势的格局，即中国对美国的主要盟友形成相对军事优势，而美国或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形成相对优势。在高技术、信息化条件下的海空作战中，因为相对优势的存在，双方都有给对手造成严重打击，甚至夺取战役主动权的可能。在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国虽然在马岛周边拥有相对的海空优势，但仍有数艘主战舰只被阿根廷击伤击沉。这也表明，阿根廷军队具备击中英国航空母舰的能力，而一旦英国航空母舰被击中丧失战斗力，英军将完全丧失战役主动权。因此，如果在西太平洋爆发海空冲突，仅在战役层面，各方都面临着极高的风险；战略层面的冲突升级风险则更为显而易见。这种风险进一步强化了各方重视管控危机，避免冲突的战略。

美国亚太军事同盟的强化，很难打破现有态势。首先，如前所述，由于地理环境和冷战历史的影响，美国在亚太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包括美国在多个敏感地区中希望借力的美日同盟，长期以来专注于盟国本土防卫，在战略、指挥协同和武器装备等方面，并不适应跨区和远程攻防作战。根据2015年4月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在日本遭受攻击时的海上作战中，日本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日本的主要港口和海峡，以及在日本周边海域的船只，美军将支援和补充日本的行动。而在他国遭受攻击时，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主要合作领域为扫雷、护航和破交。¹ 两位美国战略专家在2016年春季号的《华盛顿季刊》撰文指出，日本修订安保法案后，在武力使用范围、立法机关对于军事力量部署和运用相关决策的干预力度、远程投送能力和武器装备出口四个方面，其所受限制都远高于美国的其他“中等强国”盟友。日本只在本国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会与美军并肩作战，美国不应对日本抱有过度期待。² 可见，因为起点较低，修订后的美日同盟在战略上与北约在欧洲的集体安全尚存差距。

其次，虽然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存在进一步针对中国，并加强战备的空间，但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军事竞争并不会轻易转向全面对抗。首先，美国自身的军事战略很难完全针对中国。对华军事战略从属于美国对华战略。2016年4月27日，布林肯在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强调，美国对华政策包含三部分，一是基于共同利益，深化和扩展务实合作；二是直面、化解和减少分歧；三是管控无法化解的利益冲突。³ 同时，对华军事战略也是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美国2015年度《国家军事战略》，美国在

1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April 27 201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50427_-_GUIDELINES_FOR_US-JAPAN_DEFENSE_COOPERATION.pdf, 2016年6月4日登录。

2 Jeffrey W. Hornung and Mike M. Mochizuki, "Japan: Still An Exceptional U.S. All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9:1, Spring 2016, pp. 95-116

3 U.S.-China Relations: Strategic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pril 27 201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s/d/2016d/256657.htm>, 2016年6月4日登录。

军事上面临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和恐怖主义五大挑战，中国只是其中之一。即使在传统的大国军事挑战中，中国也并非首当其冲。2016年4月27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福德（Joseph F. Dunford Jr.）上将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2017财年度国防预算听证会上指出，俄罗斯军事力量“构成对美国利益的最大挑战”；而中国军事现代化及日益增长的军事存在“削弱了美国的相对军事优势”，“增加误解和误判的可能性”。¹ 其次，美国的主要亚太盟友虽然与中国存在竞争和领土争端，但也无意与中国全面对抗。中国与日本自2014年起恢复了高层接触和海空联络机制的对话。2016年4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华时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对日本是机遇；日中作为世界第三和第二大经济体，对亚洲及世界的发展繁荣负有重要责任；日方愿再次确认日中“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愿与中方共同努力，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妥善管控问题和分歧，不断扩大两国关系的积极面，构建新时代的日中关系。² 最后，中国重视发展与美国及其亚太盟友的双边关系，在军事战略上，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即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³；处理海洋领土争端时，坚持维权与维稳相结合的方针。在各方都无意走向对抗的条件下，如果竞争和意外事件、危机能够得到有效管控，军事竞争很难升级为全面对抗。

在战略层面不进入全面对抗的情况下，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强化很难突破各方现行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经济的束缚。例如，美国对亚太的军事部署和对盟友伙伴的军事援助，都无法摆脱其预算的制约。在美国海军总体规模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其全球范围内的兵力调整空间有限。冷战末期，里根政府的扩军将美国海军舰船数量由479艘增加到600艘，极大增强了海上力量。而在预算的制约下，美国海军当前舰船数量计划从2009年的278艘增至2021年的308艘。⁴ 由于舰队规模有限，增幅较慢，美国海军将60%兵力部署亚太的任务已接近完成。2016年5月6日，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Scott H. Swift）指出，当前美国海军在亚太部署的兵力已占总兵力的57%到58%，尚未到位的兵力也都在建造过程中。⁵ 根据美国外交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计

1 Posture Statement of General Joseph Dunford Jr., April 26 2016, US Senat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http://www.appropriations.senate.gov/imo/media/doc/042716%20-%20General%20Dunford%20Testimony.pdf>

2 王毅就改善中日关系提出四点要求, 2016年4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60009.shtml>, 2016年6月4日登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 2015年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_4.htm, 2016年6月4日登录。

4 Statement on Department of the Navy Shipbuilding Programs, April 6 2016, http://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Stackley-Mulloy-Walsh_04-06-16.pdf, 2016年6月4日登录。

5 Sasakawa USA Third Annual Security Forum, May 6 2016, Commander, US Pacific Fleet, <http://www.cpf.navy.mil/leaders/scott-swift/speeches/2016/05/sasakawa-forum.pdf>, 2016年6月4日登录。

算, 由于预算的限制和同时需要兼顾欧洲和中东的安全援助, “再平衡”战略实施五年以来, 美国虽然重视对东南亚盟友和伙伴的海上安全援助, 但实际援助金额反而低于“再平衡”战略出台前, 从2010年到2015年间, 下降19%。如果将五年的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 援助下降趋势更为明显。¹ 日本虽然通过安保法案的修订, 为使用武装力量取得了更多国内法律授权, 但其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等国内问题对于其实际军事能力的发展空间和使用意愿形成了有效制约。² 即使各方在军事投入和军事战略上都保持稳中有升的水平, 亚太当前军事战略格局也很难被打破。

在作战层面上, 基于与中国进行海空冲突的想定,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也存在缺陷。首先, 美国在亚太虽然有多个双边同盟, 但是既有潜力, 又有意愿涉足美中竞争所包含的所有区域的只有美日同盟。亚太美军在作战经验、训练水平、武器平台总体技术水平、网络和电子作战等方面相对中国有明显优势, 但也存在一些局限。美国前沿部署兵力有限, 在中国周边海域空域很难有机会和中国相应军兵种, 如水面对水面, 空中对空中进行对称作战, 而是面对中国各军兵种联合作战, 即美军所谓“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威胁。以海军为例, 在西太平洋前沿部署的主要是第七舰队, 主战兵力包括核动力航母1艘、“宙斯盾”巡洋舰和驱逐舰10至14艘、核潜艇8至12艘、两栖攻击舰4艘、扫雷舰4艘。³ 根据美国国防部发表的2016年中国军力报告, 中国海军东海和南海舰队共有驱逐舰16艘、护卫舰40艘(不含056型轻型护卫舰)、核潜艇6艘、常规潜艇38艘。⁴ 一旦冲突爆发, 在第一岛链内部, 面对中国的海空力量, 第七舰队在兵力和火力上并无明显优势。日本海空力量虽然有较强的防卫作战能力, 但并未装备“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精确打击武器, 战役进攻能力有限。日本海空力量与美军协同, 可增强美军作战编组的战斗力, 但不具备独当一面、开辟第二战场的作战能力。美国战略学界对于美日同盟在西太平洋的作战能力并不乐观, 因此提出多种建议, 包括向日本出售“战斧”巡航导弹, 以在盟友间实现分布式杀伤。或者让日

1 “Rebalance to Asia Led to Drop in Security Assistance for Southeast Asia”, April 22 2016,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www.cfr.org/asia-and-pacific/rebalance-asia/p37516?cid=nlc-public-the_world_this_week--link8-20160429&sp_mid=51268757&sp_rid=bGljaGVuMTk4NEBnbWFpbC5jb20S1#!/, 2016年6月4日登录。

2 Yoichi Funabashi, “Why Japan’s Elderly Are Endangering Its Milita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February 2016,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japans-elderly-are-endangering-its-military-14632>, 2016年6月4日登录。

3 “The United States Seventh Fleet”, Commander, US 7th Fleet, <http://www.c7f.navy.mil/Portals/8/documents/7thFleetTwoPagerFactsheet.pdf?ver=2016-01-27-061248-087>, 2016年6月4日登录。

4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ay 2016, <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6%20China%20Military%20Power%20Report.pdf>, 2016年6月4日登录。

本加强西南岛链部署,用被动牵制中国海空力量开辟“第二战场”。¹对常规力量对比更悲观的美国学者提出应启用冷战初期北约的“绊网”战略,即一旦遭到攻击,就要做出核升级的态势,甚至要为西太平洋地区的“陷落”做好最坏打算,准备反攻。²尽管如同美国战略学界和军界对“反介入”的探讨一样,中国的能力和威胁被高估,但这些讨论都折射出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在作战层面的缺陷尚未得到有效弥补。

由于战略选择的制约,美国强化亚太军事同盟的空间有限,加之中国自身军事力量的建设与发展,当前亚太军事力量对比也不会改变。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强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但这并未改变中美之间的战略态势。从战略上看,同盟的强化始于低战备的起点,未改变业已存在的军事竞争格局,各方都无意进行全面动员和对抗。由于战略选择的制约,美国强化亚太军事同盟的空间有限,加之中国自身军事力量的建设与发展,当前亚太军事力量对比也不会改变。在力量对比不改变的情况下,各方虽然出于最坏打算需要为可能的冲突做准备,但都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局限和冲突的风险,因而需要进一步强化危机管控的意识。

五、结论

军事同盟体系是美国在亚太存在和保持领导地位的重要支柱。亚太的地理环境、技术的发展、以及大国竞争和传统安全议题长期存在等因素决定了美国的同盟体系、前沿部署将长期存在。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国强化军事同盟体系的目标包括加强其对于主要盟友和地区事务的影响,促进其贸易和投资议程的实现,应对多元化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挑战。防范和威慑中国只是其目标之一。不可否认,美国出于防范和威慑中国强化同盟体系的举措,包括增加自身兵力部署、重申安全承诺、援助盟友发展军事力量、与盟友进行联合战略规划、演训和巡航等,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军事竞争和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增加误判和意外出现的几率,为中国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和维权、维稳带来新的挑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强化同盟的举措,受到美国、其亚太盟友和中国三方国内发展和国际战略选择的制约,难以改变当前亚太军事力量对比和战略格局。

美国在强化军事同盟体系的过程中,面临战略困境。为了增加对盟友的影响,提高盟友的信任,美国需要以言辞和行动来回应盟友针对中国的安全担忧。这种回应不仅无法消除相关安全问题,而且使中美关系进一步更容易受到“第三

1 Andrew F. Krepinevich, 'How to Deter China: The Case for Archipelagic Defens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5.

2 Andrew F. Krepinevich,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Defense Strategy', CSBA, October 30 2015, <http://csbaonline.org/publications/2015/10/alternative-approaches-to-defense-strategy/>, 2016年6月4日登录。

方因素”的干扰和冲击。其结果是相关安全问题不断升级和发酵，盟友对美国提出更高的要求，中美关系受到更大的冲击。这一螺旋升级对于亚太战略格局可能带来巨大影响。

操作层面的行为规范和对话机制并不足以有效防控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相互防范与竞争的螺旋升级。各方都不应回避战略层面的基本问题，而应致力于防止双方陷入无法逆转的对抗趋势和战略互信实现无望的思维定式中。中美军事与战略关系受到双边关系基本框架的制约。中国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美国的同盟体系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维持现状的防御性体系。中国和美国部分盟友之间存在的领土争端本身对各方的生存并不构成威胁。尽管存在竞争与分歧，但各方依然把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避免冲突作为其战略目标。

尽管美国希望与亚太盟友在军事同盟体系中实现进一步的分工，让盟友增强军事实力，发挥更大作用，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美国依然是其同盟体系的主导力量。不仅美国自身决定其亚太军事部署的调整方向与力度，而且盟友军事力量的增长也取决于美国的援助与支持。美国国内政治与经济的现状并不具备大力动员国内资源，加强自身和盟友军事能力和部署的条件，除非遇到国际因素剧变的刺激。因此，在应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挑战时，中国一方面需要加强必要的军事准备，应对最坏的情况。当前，美国在调整亚太部署并在盟友的军事发展上强调巩固优势的同时，补齐战役和技术层面的短板，质量与规模并重，尤其是加强远程打击和制海作战。可见，中国未来将面临更加对称的作战环境。中国应在装备发展、作战理论研究、联合作战计划和战场建设等方面做好准备。同时，中国不应忽视自身战略选择与实施对其他各方的影响力。只要中美关系保持相对稳定，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在内的国家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不断受益，美国同盟体系在中美关系的演进中将发挥持续的影响，但很难成为颠覆性力量。